

《圣经旧约》中女性形象的符号化言说

——以拔示巴形象为例

高添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 拔示巴是《圣经旧约》中的一个重要的女性形象,然而在圣经具有男权主义倾向的权力话语模式的叙述策略及叙事体系中,拔示巴作为文本叙事的一个重要对象,却完全不能将自身的话语体系和情感内核言说出来,她似乎被掏空了内里只剩下空壳,而只能沦为故事情节与冲突缺失时的形象补充。拔示巴真实的女性形象在文本中被遮蔽,其话语权力被剥夺,情感吁求被湮灭,成为叙述话语体系中被挤占与被边缘化的存在。圣经文本中拔示巴形象的全部价值在于令男性形象凸显及完满,并以此印证了以男性叙述视角书写的文本中女性形象的符号化。

关键词: 女性形象;男权主义;话语权力;遮蔽;边缘化

《圣经旧约》作为古希伯来文学的源头,以其丰富的文化涵盖性与精神信仰内涵对西方的文学艺术与风俗道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认为是西方精神文明的重要支柱,与古希腊-罗马文学并称为西方文学艺术之源。《圣经旧约》创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这其中大多是形态各异的男性形象,对女性形象的描绘与书写却寥寥无几。《圣经》中的女性或勇敢追求幸福与爱情,呈现出对自由与平等权力的无限向往,或长期屈居人下,唯有服从忍让才是她们惯常的生存状态。然而,无论文本中的女性身处哪一种存在样态,其行为动机与精神吁求都指向了圣经文本中潜在的男权主义权力话语模式。文本中的女性逐渐沦为了一种被剥夺独立意识且丧失话语权力的被遮蔽与边缘化的性别符号。

拔示巴是《圣经旧约》中最重要的女性之一,她也是《圣经》大卫的故事文本中唯一的一个女性形象。与同故事中的男性主人公大卫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相较而言,拔示巴的形象样态似乎尽可能地被压缩而扁平化,其话语言说权力及情感体系似乎都被尽可能地遮蔽和消解而逐渐只剩下一种仅仅与男性形象对立而言的符号价值。

在大卫的故事中,拔示巴因极美的容貌成为国王大卫觊觎与占有的对象,她是以连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后又成为了大卫的妻。她应召入王宫,与国王大卫同床后即离去,后告知大卫自己怀孕,因此大卫设计陷害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在丈夫乌利亚死后,拔示巴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就作了大卫的妻。而当自己和大卫的孩子因为耶和华的惩罚而死去,文本中并没有任何作为母亲的拔示巴丧子之痛的情感流露,她转而与大卫同寝,并生下了儿子所罗门。

可见故事将拔示巴的思维活动及行为生发过程完全隐匿进文本深处,只留下一个掏空了内里的会说话的绝美皮囊。如同圣经在《创世记》中便奠定了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身份基础关联——女人是由男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的,是男人的附属物——拔示巴先是女儿,再是妻子,后又成为了“大卫的妻”,她的出现向来都是充当一个男性作为主格人称的从属物,而不属于她自己。她被召之即来,也要被挥之即去,只因“怀了孕”才会使国王大卫费尽心思地去抢夺其所有权。或许她对丧子之痛并非无动于衷,但她的情感流动被完全隐匿而不能表露分毫,无须缓冲便要立刻转而投入下一次生育过程。

拔示巴受圣经的文本限制,其话语言说及行为机制无疑遵从《圣经旧约》文本整体的叙事策略。在大卫的故事中,文本线索及叙事冲突由国王大卫对拔示巴的窥视和占有为起点,又以大卫与拔示巴同寝而眠,拔示巴生育儿子所罗门为终。拔示巴作为文本叙事中冲突生成的必要主体之一,其通过语言体系表述的话语言说及情感内核外显的流露展示却在文本内容中占比甚少。仅有的“容貌甚美”这几字即是对拔示巴这一叙述客体外貌形象的完全描述,除此

之外,再无其他任何对拔示巴自身特征的形容与描摹。而且,拔示巴这一叙述客体出场时总是被冠以父名、夫名甚至所属关系,这无疑指向了女性形象在叙述话语体系中的边缘化与“无名”状态,且其自身情感的生成过程与表露方式似乎都被消解与遮蔽。这俨然是叙述主体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遵从与拔示巴所代表的女性形象相对应的男权话语体系准则。

故事中拔示巴的形象充当了一个“被看”的角色,其行为和语言表征呈现出极其外化与表象化的特点,充当在故事情节与冲突缺失时的形象补充,其形象存在的全部意义只是为了凸显其他男性形象的垫脚石而已。而以男性为中心的叙事视角便充当了叙事者“看”的角色,他们观察女性并对其进行描绘,但并不着意于女性形象情感与精神的内在流动状态,只保留了对于故事情节和冲突有推动作用的女性外显的行为过程和语言表征。于是女性成为了一个被掏空的了壳子,只能在该说的时候说,该做的时候做,缺少了行为生成的必要主体思想及意识流动过程,至此,女性的真实形象被掩盖,话语权被剥夺,真实感受被湮灭。

事实上,《圣经》企图塑造符合男性权威话语统治体系下的女性形象来影响现实中的女性,使其朝着男性理想的方向发展,从而进一步达到塑造女性的目的,拔示巴的形象便成为男权话语体系下女性形象的完美展示。女性形象所占篇幅甚少形成了男性和女性形象叙事过程中明显的差异性和不平衡,女性形象在文本中的立足之地被不断挤占而逐渐缩小,在文本能指上便不断边缘化,必然造成女性内涵在文本叙事结构中的边缘化与失语性。女性在本不充裕的篇幅中追溯自身行为动机与内在情感核心,却被男性话语权威压制而丧失了言说的能力,于是“我怀孕了”成为拔示巴在文本中唯一的语言构成。结合拔示巴对丈夫的哀悼只能在哀哭规定的日子之内,且其丧子之痛完全不能在文本中表露的潜在叙述,男权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下的女性被压迫而变得表象化。语言的极简以及情感的无能成为女性形象的完全展现,女性成为文本中无名的、不在场的、不确定的空洞所指,成为与男性对立的符号化的“女性”确立下来。因此,拔示巴以其具有代表性的绝美女性外貌进一步被男性权力话语及意识形态规定为男权股掌之中的所属物,成为红颜祸水的“妖妇”代表,成为繁衍后代必不可少的生育工具。

《圣经》中大卫的故事充分展现了文本中男权与父权制话语体系的权威,其对女性主体力量和能动性的压制与对女性形象的符号化言说也充分具有符合当时社会伦理、社会道德及社会准则的历史性特征。

参考文献

- [1]李滢波.《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3):55-58.
- [2]马月兰.《圣经》中“贤妻”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7(05):85-91.